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 a k i n g N v s h u a s a n E x a m p l e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播研究

——以女书为例

何华湘◎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 a k i n g N v s h u a s a n E x a m p l e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播研究

——以女书为例

何华湘◎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以女书为例/何华湘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ISBN 978-7-5068-3356-1

I. ①非… II. ①何… III. ①文化遗产—传播—研究—
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9598 号

责任编辑/ 牧 人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2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356-1

定 价/ 54.00 元

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双重品性

仲富兰

前几天何华湘给我来电,高兴地告诉我她的博士论文被列入教育部《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全额资助推荐出版书目,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我为她感到高兴。何华湘还特地嘱我为这本书写序,因为她是我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责无旁贷啊,所以我也不能推卸。遥想2007年何华湘从温州大学硕士生毕业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要追随我学习民俗传播学以来,我见证了她的刻苦与勤勉,见证了她的辛劳与艰辛,如今我在重读她的文稿时,不禁感慨良多。

那个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热潮带动民俗学研究的逐步升温,然而传统的民俗学更多关注的是民俗事物和现象,对民俗文化千百年沿袭不断的传承、传播机制和方法手段,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对民俗文化在时间、空间上的流变缘由、流变过程及结果,也缺乏细致深入的论证阐释。何华湘入学时,我的《民俗传播学》刚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横在我们面前的困难确实不少,要结合民俗学与传播学的两个学科,在民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以世代传承和变化着的民俗事象的“传播”作为研究对象,从人出发,以人为载体,对民俗文化在时空上的流变缘由、流变过程及结果进行阐释,最终抵达于人。当时,我曾经问过何华湘,我走的是一条非常艰难的学术探索之路,也有可能最终走不通,我怕误人子弟,罪莫大焉。但何华湘还是坚定地追随民俗文化传播研究,对于民俗文化传播与民族文化认同进行有效勾连,三年的博士生研读生活,她利用寒暑假,深入她的故乡湖南道县、江永一带,以古老的女书为参照,对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播

进行了整体剖析,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播的关系,着重探讨与分析作为一门民俗学与传播学相交叉的边缘学问,从女书这一非遗特定事项出发,勾勒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特点与规律,对当前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与阐释。对此,我是非常赞赏与支持的。

何华湘的这部博士论文,以女书为例,林林总总分为六个部分,其实更概括地来分析,本论文说了两个互有联系的民俗传播学命题:传播与利用。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属性及其传播学意义;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具体包括何华湘提出的善用媒体、亲近校园、重视民间、慎对“产业化”等。

下面我想结合上海市的民俗文化传播谈一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双重品性的意见,向各位专家通人请教。

民俗文化是依附于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其集体性培育了社会的约定俗成性,增强了社群与民族的认同,强化了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品格,集体创作、集体遵从,并且按照一定的模式反复演示,不断实行。虽然看似驳杂而散乱,却具有城市文化根脉所系的特征。上海民俗文化的内在结构,表现为一种被绝大多数上海人(包括海外沪人)所认同的上海城市文化精神;作为一种外在形态,它包括一切隐含着上海城市传统文化精华、反映时代和实践精神、体现中华文化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和载体。这些符号与载体,可以溯源于上海这方土地土著先民的文化创造,但在上海开埠以后的社会环境之中,独具一格,别有特色。因为开埠前的上海,与江浙毗邻地区的民俗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上海开埠之后,其特色就鲜明地凸现出来。她是上海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民俗传播的过程中,代代相传,被不断地创造出来和传承下来的文化,反映了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社会风情和风俗习惯。

如今,许多人都在说,上海开埠之前只是一个小渔村,我看,这种说法迎合了西方人的观点,好像只有他们进入上海,上海才开始了真正的繁华。上海民俗文化传播的漫长过程,应该分三大历史时期,第一阶段是远古社会到1843年上海开埠,第二个阶段是上海开埠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第三个阶段则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创意产业,说明上海文化站立在一个新的历史起跑线上。

从聚落到部落,到村镇到市政,上海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在这片处女地上蔚稻、养畜、打渔猎兽、纺线织布,发展生产,经营生活。据上海考古专家研究,距

今约 6000 年的上海人有一个重大发明就是水井,使人类首次不完全依赖河湖水源,这是生产力发展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跨越;5000 多年前的上海先民发明犁耕农业,也是里程碑式的革命。崧泽遗址中层出现了罕见的 100 多座墓葬的大型墓地,说明当时上海的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增幅。陶器以黑衣灰陶为特征,器型明显增多,而且出现了一批杯、觚、瓶等用途明确的饮酒器,反映了稻作农业已经相当发达,有了可以酿酒的余粮。

北宋熙宁十年(公元 1077 年),官府在华亭县东北一个名叫“上海”的大聚落设立酒务,名叫“上海务”,管理附近地区的酒类买卖和酒税。这条史料,见之于《宋会要辑稿》,是上海悠长酒文化的历史见证。南宋咸淳三年(公元 1267 年),在此正式设立镇治,并派镇将驻守。因地处上海浦西侧,便称“上海镇”。从“上海务”到“上海镇”,是一个飞跃,前者堪称史籍记载最早的以“上海”相称的聚落,而“上海镇”的出现,她已经是一个新的贸易港口,成为风樯浪舶,商贾糜集之地。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考证,“上海”聚落出现的实际时间,起码在五代末或北宋初,也就是公元十世纪前叶,距今已有一千多年。

元至元十四年(公元 1277 年),在元兵占领上海的次年,在上海镇设立市舶司,市舶司是官府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此后,元政府又在上海设立管理海运漕粮的万户府、负责地方治安的巡检司、承担交通的水驿等新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立,充分说明上海的经济在发展,聚落在扩大。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 1291 年),朝廷将华亭县东北的五个乡划出,定名上海县。上海县的设立,是上海建城的开始,它标志着上海从许多普通江南市镇中脱颖而出,成为县级政治中心之一,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南名邑”。纵观 6000 年,自下至上,层层叠压,代有文物精品埋藏的教科书式的惊世遗址福泉山,也在上海。中国新石器时代最精美的透光湖绿色琮形玉镯,中国轻薄如纸细刻繁密纹黑陶壶等文物,方塔、紫丹苑水闸、豫园等优秀古建筑,黄道婆、徐光启等历史名人故居遗迹等文化遗产,使上海这座城市成为了形象饱满、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

上海民俗文化史的第二阶段开始于 1843 年的开埠,这个历史阶段也很长,一直到 2010 年上海举行世博会,开始了上海民俗文化的第三阶段。上海正式开埠于 1843 年 11 月 17 日。这是上海民俗最富有特色的历史阶段。上海自开埠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在百年间创造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中国“第一”、亚洲

“第一”乃至世界“第一”。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任何一座城市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的城市史中也不多见。

上海开埠后数百万国内移民来自中国南北各地,特别是江浙皖这些经济文化水准长期领先的地区,所以这些移民既有较高的素质,也不乏相互间的竞争和融合,因此其文化内涵表现在:中西风尚的混合交汇,对待洋人的平和态度,各地商帮的聚合效应,精于算计的理财意识。

开埠之初,上海开埠地一带就由一片荒滩洼地魔术般变化得洋楼耸峙、工厂林立、道路纵横交错。租界的繁荣和稳定吸引了大量中外人口,而成为五方杂处、华洋杂居的移民城市。大批中外投机家、冒险家不仅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

各地商帮纷纷涌入上海,给当时的上海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航运业特别是内河航运业成为上海的一大支柱产业,上海的许多豪富均以航运业起家,形成万商云集之格局。各地商人在开埠地为了巩固自己的商业网络,形成相互协作、彼此支撑的联系,更为了联络同道,协调彼此的利益,就需要一定的组织来维系,近代商业会馆这样的组织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各地移民集聚上海,经过碰撞、交汇,甚至经历过痛苦的煎熬和历练,最终形成的城市传统,凝聚着几代上海人的民风民俗,充分体现上海这座城市的魅力和内涵。这种在商业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民处事风格和处世态度,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而弥散在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原理非常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涉及传播与传承,而且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从学理层面阐释这些原理,有助于促进传承人(群体)文化权利的实现;激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上海民俗文化资源是上海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我觉得第一位的任务是传播与保护并举,保护上海文化资源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息息相关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组织明确提出把上海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和创意产业结合在一起的思路。事实上,如何珍视并保护和利用好上海文化资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光荣职责。为了抓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我们应当在城市文化资源保护、智慧财产的形成与应用

上有所作为。基于上海当前的实际和发展需求,上海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有太多的想象值得期待。

但是,在快速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热潮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以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形成了上海特有的城市记忆,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大拆大建的开发,致使一片片积淀丰富人文的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由于忽视对上海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会带来城市文化空间破坏、历史文脉割裂,社区邻里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消失的可怕后果。再如开发建设中的“同质化”的倾向,一个模板四处复制,许多古镇已经没有上海特色,“假古董”横行,建了一个“新天地”,全国冒出了一批雷同建筑……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孕育了绚丽多彩、种类繁多的宝贵文化资源,但它们到底具有哪些门类,有什么核心概念,代表性的符号与元素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解释和记录。在网络技术沟通无限、网民人数激增的媒介环境中,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弥漫在城市的文化之中,消解着人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所以我想说,泛泛地谈上海文化资源保护已经很苍白了,眼下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上海传统文化资源的结构性保护,政府主管部门与相关社会组织要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组织人员对上海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展开讨论和研究,廓清、明晰相关概念,完善和阐释上海文化资源的分类体系和知识内容;编写比较完整、翔实、可靠、权威的目录和材料;构建以上海文化资源和创意产业为专题的文化集成性项目。要将这项工作作为文化工程来实施。它是上海文化走向繁荣的一个基本的前提。

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未来。历史上,上海曾经拥有世界瞩目的文化大师和文化名人,上海曾经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上海曾经有过令人激赏的辉煌,不能让这些文化资源仅仅长存于人们的记忆中,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上海应该深化自身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进一步拓展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的渠道,努力构建与现代化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与城市功能相匹配的比较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开拓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新的支柱文化产业,完善文化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优化文化发展格局,改善文化生态环境,使上海真正出现人才荟萃、精品迭出、和谐有序、走势强健的文化发展新局面。

现在,大家到处谈论文化创意产业,我认为城市特色、地域个性鲜明的民俗文化是一个地方最宝贵的资源,她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可复制的最稀缺资源。本末不能倒置。任何时代的文化都只能在以前时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不可能割断文化发展与传承的历史,凭空创造出一种文化来。一点一滴地培育、一代一代地传承,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上海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靠的就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两岸的上海儿女薪火相传、接续培育、不断创新的结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首先需要张扬这种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来滋养和激发民众的文化创造力、铸造民族凝聚力。遗产保护的意義在保护民俗文化这份遗产的过程中,认清民俗文化资源传承与利用的双重品性,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要使继承与弘扬有所依据,发展与创新有所依托,就必须首先要将保护工作置于相应超脱的独立地位,不能急功近利地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片面视为推动经济发展或者提升政绩的实用手段。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保护,现在确实有“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情况,其实不是老百姓没有热情,而要看你的文化保护政策是不是具有吸引力,表现为提升市民福祉,提升城市创新力;许多社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市民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你是做做表面文章,发发号召,做做样子,与广大市民切身利益无关,民众当然不会有积极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所以,主要还在于如何引导,如何将文化与市场,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联系起来。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科技等相互渗透与融合日益深入。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应该通过传媒界,让普通市民都认识到上海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与自己生活的城市空间的密切关联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对于我们城市未来发展的意义。再说任何一项民俗的产生与发展、变迁与转型、差异与冲突、整合与创新、生产与再生产,都是在传播中或者销声匿迹的。特别是当社会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传统民俗面临着激荡和剧烈的变异,它的传播特征就更为明显了。所有民俗的传承变更,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信息传递来完成的。民俗传播拓展了民俗的时间和空间,从而也拓展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时空形态。因此,要通过民俗传播的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动态过程中,把握住民俗文化的特质。很显然,传播是民俗研究之网的“纽结”,抓住了民俗

传播,也就抓住了民俗文化研究的“牛鼻子”。

借着为何华湘博士论文写序的机会,我发表上面一些看法,与何华湘共勉,也求教于诸位读者方家。我希望何华湘继续努力,学无止境,“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学术创新是一件异常艰难的工作,任何学问做到极致都可能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知识永无穷尽之日。

2012年7月2日于沪上五角场“凝风轩”

前 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是一种动态的、活态的传播,主要以人为载体,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代际传承。随着老辈传承人的逝世,他们身上的文化内涵也就随之消亡。这种对人的极大依附性限制和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效果。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传统的传播方式很难适应当今正在急速变化的传播环境,必须寻找新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

本书以流传在湖南江永、道县一带的女书为参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播进行了整体剖析,明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播的关系,勾勒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特点与规律,对当前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与阐释,并进一步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设计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传播策略。全书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特点入手,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播的关系,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本身就包含了传播的要求在内,它必须是经得住世代传承的文化传统,并且其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艺术价值所形成的动力又促使其自身继续传播下去。传播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下去的必然要求。

第二章运用文化传播的方法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特点,结合实例,从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载体等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达、传递、接受进行研究,通过与物质文化的比较得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特点。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 >>>

第三章首先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环境的构成要素,分析地理、人口和传播技术等各要素对形成传播环境的作用,随后分析传播环境的变迁,并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变迁后的传播环境的适应情况。

第四章引入伦理学的方法,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伦理的概念,从传播学与伦理学、法学交叉的角度,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存在的若干伦理问题进行解读和辨析。

第五章专门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效果。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根据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传播情况,勾勒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理想效果图景。

最后,根据前面五个部分的研究和探索,针对我国国情,第六章提出对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实际指导作用的传播策略,包括:善用媒体;亲近校园;重视民间;慎对“产业化”等。

目 录

CONTENTS

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双重品性	1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属性	12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12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20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属性	26
第四节 传播中的女书	34
第二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特点	46
第一节 符号传播	46
第二节 时空意义的传播	59
第三节 以人为本的传播	73

第三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环境	87
第一节 传播环境的构成	87
第二节 几种不同形态的环境变迁及适应	101
第三节 女书传播的原生态与次生态	109
第四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伦理	114
第一节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之争	114
第二节 大众传播的伦理悖论	122
第三节 女书传播中的伦理问题	127
第五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效果	133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效果研究的特殊性	133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效果沟”	136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想传播效果	147
第四节 女书在两个阶段的传播效果比较	152
第六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策略	159
第一节 善用媒体	159
第二节 亲近校园	164
第三节 重视民间	167
第四节 慎对“产业化”	168
结 语	171
 附录:发现真实的女书	176
参考文献	263
后 记	269

绪 论

一、选题及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提出的概念,在我国也被称为“精神文化遗产”或“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其中要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传心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这就势必要求首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非物质文化的理论研究,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传播。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目标是: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传承和发扬是遗产保护的最终旨归,是优秀的传统非物质文化在代际上的延续和地域上的播扬,亦即在时空上的传播。可见,传播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更是明确指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尽管这里的传播概念是狭义的,但足以说明传播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之一。

国务院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要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 and 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由此看来,不管是保护、抢救,还是利用和传承发展,都必须借助传播的手段和方法,必须在传播中进行。因此,传播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

由此可知,传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价值,它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又是其重要内容,并且还是必不可少的工。传播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课题中的应有之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进行研究,切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是保护、传承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传播研究,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维护全国各民族安定、统一、团结的政治局面,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是一种动态的或活态方式的传播,它不以物质的形式来

表现,也不受物质载体的保障和约束。因而,其传播与物质文化的传播不同,在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上有自己的特点。因为是活态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偏重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即代际传承,以人为载体,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随着老辈传承人的逝世,他们身上的文化内涵也就随之消亡。这种过分依赖于传承人的传播方式限制着传播效果的广度和深度,随着文化全球化和文化霸权主义的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传统的传播方式显然很难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发展,必须寻找新的传播渠道与传播方式。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也就成了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其意义不言而喻。

从传播学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涉及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三门学科。这三门学科都是新兴学科,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检验各学科的现有理论,一方面又可为学科理论建设添砖加瓦。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还兼具学科意义和理论意义。

为什么以女书为例?原因有以下几端。

首先,女书以女字为基础,涉及方言、口头文学、唱读表演、女红、女性社交习俗、信仰等多方面的文化事象,形成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的女书文化,几乎包括了国际分类所定义的非文化遗产的五大类型。以女书为例,可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种类型,在进行从个别到一般的推论时不致发生偏颇。

其次,女书的流传范围相对固定和确切,在历史上和学术界没有异议。女书的传承群体稳定,传承脉络基本清晰,容易把握其传播路线,进而才可能对女书文化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特征和传播规律作出清晰的勾勒。

再次,以女书为研究对象,理论上和应用上都有较大的拓展空间。目前女书文化的影响力已经全方位辐射开来,相关的活动有:传承人保护与培养、档案记录、专家研究、语言文字开发、书法艺术、手工艺生产、旅游开发、文艺创作、商业宣传……五光十色的女书活动营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女书文化生态群落。其中的种种关系、现象、矛盾,都是值得研究的传播问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最后,由于女书是笔者家乡的文化事象,笔者在多年的田野调查和乡间采